

# 从《暴风雨》中看莎士比亚的反乌托邦精神

张 童

( 哈尔滨师范大学 西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莎士比亚的作品《暴风雨》常被认为是剧作家乌托邦思想的体现。虽然作品中提到了乌托邦的设想,但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绿色世界”模式和对作品中人物、台词的分析,可知剧作家对人性和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不会单纯地寄希望于一个乌有之乡。通读整部作品,无论剧作家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体现的是一种反乌托邦精神。

**关键词:** 暴风雨; 莎士比亚; 反乌托邦; 绿色世界模式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7836(2013)06-0119-02

《暴风雨》这部作品是莎士比亚晚年的传奇剧之一,也被认为是他最后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常常被认为是体现了莎翁的乌托邦思想,因为作品中提到了乌托邦的设想。不过笔者却有一种相反的想法,那就是莎翁的作品中,无论剧作家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反乌托邦精神。

## 一、绿色模式中的反乌托邦精神

乌托邦思想的源头是由于海外殖民地的建立,人们认为或许可以在一个全新的地方建立起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描述的都是一个海岛,也就是所谓的“世外桃源”。《暴风雨》也把舞台设置在一个海岛上,看似迎合了这种世外桃源的主题,但如果读完了整部作品,就会发现作者虽然描写了世外桃源的存在,但它却不是作为最终的目的地而存在的。这就涉及到了莎翁剧作中“绿色世界”的创作模式。

“绿色世界”模式即故事的展开地点在丛林、旷野、海岛等地<sup>[1]33</sup>。除了《暴风雨》之外,在莎翁其他的作品中,这种模式也很明显,如《仲夏夜之梦》中赫米娅和拉山德私奔到雅典郊外的森林中,《冬天的故事》里波希米亚王子弗罗利泽和潘狄塔在草原上幽会,《辛白林》中伊末琴女扮男装逃到威尔士山野遇见了失散多年的哥哥们等等,人物活动的地点和背景都是野外,而这野外的世界常常是剧中人物的乐园。这种绿色世界是作者的一种对自然的美好赞颂,但这并不是一种对乌托邦的向往。乌托邦作为一个主题,真正提出是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之中,其后也有很多描绘乌托邦的作品,都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乌托邦是一种“文明社会”,人们天性善良,道德高尚,过着庄严、纯洁的生活<sup>[2]119</sup>。

这样的文明的乌托邦是和自然相对的,甚至可以说是与人的本性相对的,所以是不现实的。而纵观莎翁的创作,剧作家对人性和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他并不会肯定这样一种社会。

莎翁对人性和现实的清醒认识主要表现在他第二阶段创作期的作品中,这些作品中,莎翁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非常现实的批判,背叛、阴谋、仇杀、争权夺利、家族仇恨成为了剧作的主题。剧作家在作品中更为客观地对人性作出了判断,正如《暴风雨》中,不再是通常的道德感化恶人,剧中的恶人安东尼奥最后也没有说出一句忏悔的话语,所以无从判断他是否真的忏悔了;戏剧的最后,普洛斯彼罗的致辞中也体现了一种类似无可奈何的情绪,即寄希望于人的自觉的道德力量来约束恶。

然后再来看作品中的一些对白,米兰达初次看到阿隆佐等人时,她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赞扬:“神奇啊!这有多少好看的人!人类是多么美丽!啊,新奇的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sup>[3]72</sup>有的评论认为这句话是莎翁借剧中人之口赞扬人类的美好,宣扬了人文主义思想。笔者对此有一种不同的理解。从剧情中我们得知,米兰达赞扬的这些人中,有篡权夺利的人——安东尼奥,有心怀不轨的人——西巴斯辛,就连看起来比较无辜的国王阿隆佐,也是迫害普洛斯彼罗父女,使他们流落荒岛的始作俑者。这句赞美的话反而带有一种讽刺意味。这种讽刺可能是有意为之,因为莎翁对现实世界已有了清醒的认识,而不再是持一种比较单纯的仁爱宽恕观念,作者已经看到了人性中的恶,虽然他寄希望于道德、仁爱的力量,却不可能单纯地相信会有一个“人人都自觉行善高尚纯洁”的乌有之乡。

回到“绿色世界”模式上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根据

收稿日期: 2013-01-06

作者简介: 张童(1986-),女,黑龙江大庆人,英语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莎翁的作品内容,可以把莎翁的叙事大略划分成“现实世界—绿色世界—现实世界”这样一种模式<sup>[1]33</sup>,比如《暴风雨》中,虽然主要剧情都是发生在一个海岛上,但从整体情节来看,普洛斯彼罗和女儿米兰达是被逐出米兰,漂流到这个孤岛上的,而皆大欢喜之后,他们又随着国王和王子回到米兰,正符合了这样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中,“绿色世界”往往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的,现实世界丑恶肮脏,野心、嫉妒、自私等等充斥其间,相反绿色世界纯净自由,人的心灵在此得到了净化<sup>[1]34</sup>。但这样的绿色世界并不是莎翁乌托邦理想的体现,正如前文所述,作者是现实的,从现实世界来到绿色世界的人终究要回到现实世界中去。在早期的作品中,人物在绿色世界中或得到了美好的爱情、或得到心灵的净化,最终把这份美好也带回到现实世界中去。而《暴风雨》则是由普洛斯彼罗的致词作结尾,透露着对回到现实中的未来的无可奈何“现在我已把我的魔法尽行抛弃,剩余微弱的力量都属于我自己;横在我面前的分明有两条道路,不是终身被符咒把我在此幽锢,便是凭借你们的力量重返故邦。……我再没有魔法迷人,再没有精灵为我奔走;我的结局将要变成不幸的绝望,除非依托着万能的祈祷的力量,它能把慈悲的神明的中心刺彻,赦免了可怜的下民的一切过失。你们有罪过希望别人不再追究,愿你们也格外宽大,给我以自由。”<sup>[3]78</sup>因此笔者认为,莎翁作品中的绿色世界是作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思考,但并不是乌托邦精神的体现。

## 二、对乌托邦和人性的清醒认识

《暴风雨》之所以被认为是莎翁乌托邦思想的体现,是由于在剧中贡柴罗的台词提出了乌托邦的构想,这段台词中他提到“要实行一切与众不同的设施;我要禁止一切的贸易;没有地方官的设立;没有文学,富有、贫穷和雇佣都要废止;契约、承袭、疆界、区域、耕种、葡萄园都没有,金属、谷物、酒、油都没有用处,废除职业,所有的人都不作事;妇女也是这样,但她们是天真而纯洁;没有君主——”<sup>[3]28</sup>。然而,贡柴罗向众人陈述自己的壮志雄心,得到的却是别人的讽刺,“西巴斯辛:但是他说他是这岛上的王。安东尼奥:他的共和国的后面的部分把开头的部分忘了”<sup>[3]28</sup>。从创作年代上来讲,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要早于莎翁的剧作,假如说莎翁是对《乌托邦》这部作品有所了解的,则可以从这段中看出剧作家对这样一个国度的态度并不是肯定的。众所周知,《乌托邦》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公有制<sup>[2]4</sup>,可是在一个公有制的国度里却存在帝王,虽然这帝王无比英明,几乎到了神的境界,但他依然是统治阶级,国家的政策即使完美无缺,却不是靠着人民建立的,而是依靠统治阶级颁布实施的,这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公有制,这是《乌托邦》中的公有制本身的矛盾和局限。莎翁通过其他人物对贡柴罗构想的讽刺,可以看作他对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或者也可以认为这是莎翁对乌托邦的一种讽刺。

剧作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角色,就是丑角凯列班。凯列班是一个野人,是女巫和魔鬼的儿子,这个角色非常具有

象征意义,有的评论认为凯列班是殖民地原住民的象征,而笔者认为他更象征着人的原始兽性,容易被蒙蔽,会屈服于欲望、沉溺于酒色中,这是未经过文明开化的人的本性,如果把剧中普洛斯彼罗看作文明的象征,那么他在剧中的一段台词就可以看作文明对人的兽性的评价“一个天生的魔鬼,教养也改不过他的天性来”<sup>[3]62</sup>。剧作家在经历了对人性深刻的追思后,已经感知到了人性中必然存在的兽性,恶也是人性中不可避免的组成,这并不是文明教化能够消除的。因此,凯列班不仅是一个丑角,而是剧作家对人类兽性的一个影射和放大。在剧作最后凯列班吃尽苦头后说“从此以后我要聪明一些,学学讨好的法子。”<sup>[3]76</sup>也可以看出,这个角色并没有悔改之意或者自惭形秽,这象征着在人性中的兽性受到文明束缚后,或许会被掩盖,或许会被压制,但是并不会彻底消失。这再一次说明,一个经过文明的净化后人人一心向善的乌托邦社会,从人性的本质上看只是一种空想。

从莎翁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描写的大量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无论是如麦克白这样的野心家,还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小丑,都具有自己的强烈个性。悲剧人物如哈姆莱特、麦克白等,都表现了人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他们追问人性,追问生与死的意义,寻找人性超越的方法与途径,这表现了莎翁持有的一种怀疑论的人文主义观念,这种怀疑论的人文主义观念更为重视人性,更倾向于不断追问人的价值,同时也认为人是有限的存在,无论知识、道德都是有限的<sup>[4]</sup>,这是对人性的一种肯定,既肯定人性的美好,也不否认人性的局限。由此可看出,即使莎翁在创作中并不是有意识地否定乌托邦,他的作品中的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也是反乌托邦的。

## 三、结语

《美妙的新世界》的扉页题词中说到“乌托邦是可以实现的。世界正朝着乌托邦奔去。但一个新时代可能已经开始。在这个时代,学者和知识阶层可能会设想出一些方法来避免乌托邦的实现,并返回到一个非乌托邦的社会。后者可能不那么完美,却更自由。”<sup>[5]</sup>自由、人性,不正是莎翁作品一直以来致力表现的主题吗?因此笔者认为,说莎翁具有一种乌托邦理想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而恰恰相反的是,莎翁的作品,无论剧作家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都是一种反乌托邦精神的体现。

### 参考文献:

- [1]洪增流.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绿色世界”[J].外国语文,1996(1).
- [2]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戴镗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3]威廉·莎士比亚.暴风雨[M].朱生豪,范锐,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
- [4]肖四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三种主要形态[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4-20.
- [5]阿道斯·赫胥黎.美妙的新世界[M].孙法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5.